



J. S. Mill

[英] 约翰·密尔 著 | 孙传钊 王晨 译

JOHN MILL ON UNIVERSITIES

密尔论大学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919-1887

JOHN MILL ON UNIVERSITIES

密尔论大学



J. S. Mill

[英]约翰·密尔 著

孙传钊 编译

王晨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尔论大学 / (英) 密尔著 ; 孙传钊, 王晨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832-8

I . ①密… II . ①密… ②孙… ③王… III . ①高
等教育—教学理论 IV . ① G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43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密尔论大学

[英] 约翰·密尔 著
孙传钊 王晨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832-8

2013年6月第1版 开本889×1194 1/32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5.75

定价:25.00元

目录

1

·

编译者的说明

13

·

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

104

·

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

178

·

译后记

编译者的说明

约翰·密尔在各个领域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之所以还产生编译这部小书的想法，是因为翻译过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一书，受希尔斯的启发，想把密尔关于大学的著述也编辑成一本小册子。

尽管约翰·密尔自己未曾接受过大学教育，却在父亲指导下的家庭教育中成长为一名跨越多个领域的杰出学者。按照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说法，约翰·密尔是懂得所有事物中某一事物、又对某一事物的整体也很精通的人（“あらゆることについて何事かを知っており、何事かについてはあらゆ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人”），是位博识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局限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分子。

密尔还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晚年——确切说60岁那年——1867年2月1日，在繁忙的议员工作之余，被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选为名誉校长。就任名誉校长的典礼上，他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系统地论述自己的大学教育观。这次演说后来以单行本形式

出版,即《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1867*)。我国绝大多数研究英国大学史的学者都从二手著述中转引这篇演说内容,而且还常把“名誉校长”误为“校长”。这也是我翻译这篇演说的一个动因。

在自传的最后部分,密尔曾谈到他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这次演说:

我很荣幸地被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选为名誉校长,并按照惯例发表了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我就一生积累的有关博雅教育的许多学科发表了很多想法和见解,谈到了它们的功能和影响,以及为了使这些学科发挥最有益的影响应当采取的方法。为了证明圣安德鲁斯大学旧的古典学科和新的科学学科有同样高的教育价值,我采取的立场比大多数宣传者的极力主张更加坚定,认为只因为很久以来常用教学法的愚蠢无能才使得这两大学科被人看作是竞争者,不是合作者。我认为这典礼不仅有助于促进在全国大学中已顺利开展的改革,而且能在最崇高的理念的培养下,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中传播比我们平时接触的更加公正的思想。^①

^① 《我的知识之路》,郑加丽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358—359页。

密尔做这次演说时，英国大学内的“旧的古典学科和新的科学学科”虽然并存，却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围绕这两大学科在大学中应有怎样的地位，以古典语言、人文学科为核心的传统的博雅教育、英国的绅士教育，如何应对急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的挑战，已经出现了由社会学家哈佛·斯宾塞和作家哈克斯利为代表的、主张以自然科学新成果为教学课程核心的“新博雅教育”体系的一派。与这新博雅教育体系相对抗的、坚持传统博雅教育的代表人物是马修·阿诺德和温彻斯特学院院长乔治·莫巴利。从演说来看，密尔站在阿诺德等人一边。

密尔和亨利·纽曼也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在强调古典语言、古典人文学科重要性这一主题上，密尔的就职演说与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有很多共同关注的点，但密尔与纽曼最大的区别是，密尔不是基督教虔诚信徒，身处牛津、剑桥大学之外，主张英国的大学（严格地说是英格兰的牛津、剑桥）应该克服国教教派的宗派性，大学要从宗教教义教学中解放出来，才能做到真正地探索真理。他和接受德国观念论影响的马修·阿诺德的立场比较接近，认为古典人文知识最终是研究现实世俗文化的工具，是社会改良的工具。所以，阿诺德读了他的这篇演说后，曾去信表示赞同。和在各个领域（包括他主张的功利主义）常取折中的立场一样，密尔也不否认大学可以培养世俗社会的专家。比如，他认为法学院

培养律师这样实用专门的人才也未尝不可,但是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掌握事物本质原理的哲学的律师。纽曼本质上是想依靠宗教信仰而不是靠科学知识来改造世界。

其次,密尔在演说中推崇苏格兰的那些古老大学的传统,特别是苏格兰的大学古典语言教学的传统。与英格兰的大学(牛津、剑桥)传统相比,苏格兰的大学很少接受外来的经济资助,所以受到利益关系者干涉少,改革的阻力小。古典语言希腊文、拉丁文的教学,不是注重于文体的形式,不把掌握古典语言作为绅士身份的标志,而注重于古典语言作为当下学术研究的工具性、实用性。198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论争英国绅士人文主义教育与大英帝国衰落之间的关系时,相对于牛津、剑桥,苏格兰的大学启蒙、理性的传统经常作为务实的正面例子被人提起。演说中,密尔强调牛津、剑桥那种追求形式的古典语言教学和现代外语教学必须改革。他的这些见解,值得今天中国过分偏重英语教学地位的大学管理者一读。

再次,演说中,密尔把大学教育任务分成三个领域:围绕美学的“艺术教育”、以智育为目的的“知性教育”和培养人的良心的“道德教育”。他认为“艺术教育”虽是辅助德育和智育的,但是对于人格完善来说,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与欧陆诸国相比,英国教育传统因为受到商业拜金主义和清教徒宗教信仰

影响,历来轻视艺术教育。艺术、情操教育的贫乏导致国民的精神危机。强调通过艺术、美学教育达到情感培养、精神高尚的目的,是密尔大学论独特的方面,也暗示了英国资本主义全盛时代的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密尔是个自由主义者,他的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与古代自由学艺(liberal arts)相连的。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当一个社会的整体审美情趣十分低俗,特别当它的精英们也是如此时,国民追求自由的能力和求知的欲望也会变得低下。

就职演说中,他提到早年撰写的《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一文。《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也是19世纪英国大学围绕课程改革争论的产物,尽管文章涉及课程设置问题不多,但是详细讨论了道德教育中关于人性的本质问题:功利主义与德育的关系,后天德育的必要性。这些论题也值得我国德育研究者注意。另外,当今中国教育学界也有不少人,屡屡错误地阐释和运用“功利主义教育”这一源自西人的概念,把中国传统科举形成的为了获得“颜如玉”、“黄金屋”的功利观乃至今天教育领域内诸多腐败现象,与边沁、密尔父子等人倡导的“功利主义”简单地直接等同、比附、联系起来。这是对“功利主义”的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密尔在《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中,明确要求学生们“蔑视卑俗的、利己的目的”,“不能把自己及其家族的富裕、出人头地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要超越利益的报酬来考

虑自己的前程。又如,约翰·罗尔斯尖锐批判功利主义,但是罗尔斯也曾高度评价一位功利主义者——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亨利·塞奇威克(Henry Sidgwick, 1838—1900)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因为亨利·塞奇威克在他的《伦理学诸方法》、《经济学原理》等著作中强调,经济危机中的英国,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是可以调和的,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虽然不能放弃个人自由,但是从人类全体的幸福考虑,也不抛弃少数人的幸福,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财富,要对政府的经济介入和规制留有余地。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经济学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前驱。和密尔一样,亨利·塞奇威克也反对国教对大学教学、学术自由的束缚。剑桥大学规定教员任职时都必须宣誓忠于英国国教。亨利·塞奇威克冒着失去饭碗的风险,公开拒绝、挑战这一传统规定,结果,当时首相格拉杜斯顿因此顺应时势废除了剑桥的这一规定。亨利·塞奇威克开创了不宣誓而受雇于剑桥大学的先例。可是,和密尔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观点不一样,亨利·塞奇威克认为经济与政治等其他领域密不可分,经济学很难作为独立学科进行孤立的教学。因此《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中详尽地阐释社会功利和个人天性的关系,对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也有警示作用。

《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和《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的初出时间相隔30余年,说明了

密尔所处的时代,整个 19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虽然尚未明显衰退,传统的人文古典学科却正在衰退,现代科学、实业学科兴起并发生冲突。教育领域中的这个冲突,可以说到今天依然是学界的话题。20 世纪 70 年代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的文化批评所点燃的关于英国是否衰退的学术争论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这场争论涉及英国近代社会以后的文化、教育理念是否是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的。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的话,英国文化是不是世界上最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的?由此出发还引出了四个与教育相关的重要问题:1. 19 世纪末公学的教育体现了绅士阶层的中产阶级共同的反产业主义精神;2. 与金融业、商业等相比,传统公学教育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业家子女选择前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 事业成功的制造业产业家子女都离开父辈开创的事业,流入传统绅士身份从事的职业,导致人才流出;4. 公学毕业的产业家真的受到这种负面影响而经营不善吗?因为维纳认为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英国绅士教育不仅是半吊子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源,也是现代化——现代产业发展的绊脚石。在这个论题上,对维纳发出最有力反击的是澳大利亚学者鲁宾斯坦。他认为 18 世纪以来英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并没有衰退。在《1750—1990 年间英国的资本主义、文化及其衰退》(*W. D. Rubinstein Capitalism, Culture, and Decline in Britain 1750—1990*, 1993)一书中,鲁宾斯坦强调德国

大学 19 世纪人文主义对现代性的抵抗比英国激进得多,而英国正是 18 世纪形成的绅士主义造就了不走极端、中庸的好传统,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鲁宾斯坦认为重视人文教育、传统文化是欧洲普遍现象,也是英国近世文化的特征。英国制造业不发达,金融业、第三产业职业与绅士身份一致,发展迅速,变得强势,对毕业生有吸引力等现象,都不是弱点,也不标志衰退——是对外资本输出的帝国主义国策的结果。他在 2000 年出版的《反思英国衰退》(*Rethinking British Decline*) 这本论文集的“英国文化与经济实绩”一文里坚持阐述了 1993 年的观点。澳洲教育史学者迈克尔·萨德森(Michael Sanderson)也对百余年来教育拖了经济的后腿、导致经济长期衰退的通说提出三个方面反论: 1. 1890 年至 1914 年间,为了与新兴德国、美国竞争,大声呼吁强化技术、工科教育的人,不是来自制造业的实业界,而是政治家和学者。2. 英国虽然大学的工科、高级技术学院发展滞后,但是其培养技术工人的学徒制度有一定合理要素,即职业训练成本由雇主和学徒这两方职业教育的受益者负担,不动用国民税金,两方为了自己长远利益都具有主观的积极性。3. 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工业迅速发展,带动了教育体制进步,当时德国教育体制优于英国,但实证研究的史实表明,英国 19 世纪后半期的教育体制乃至大学的实用学科水平,并不比德国差多少。通观《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

的演说》中密尔的大学观，多少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在工业化、商业化强势冲击下，密尔对人文主义的恋情的退却；密尔的折中也反映出维纳和反击者们——论争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书收入的第二篇文章，即1835年4月号的《伦敦评论》(*London Review*)刊登的《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是约翰·密尔评论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 1785—1878)《有关大学研究的讲义》(*A Discourse on the Studies of University*, 1834)这篇论文。塞奇威克当时是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特立尼铁学院(Trinity College)的评议员(Fellow)，也是英国国教教会的牧师。他于18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特立尼铁学院，后留校任教。1818年，不是地质学出身的塞奇威克自学成才，研究成绩得到同行公认，晋升为地质学教授，这在当时的剑桥大学也是一个异例。1829年塞奇威克担任伦敦地质学会会长。发表《有关大学研究的讲义》时，作为地质学学者，他在英国已经颇有名气，在大学内也是中坚力量。而且因为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受学生欢迎。每年夏天组织学生野外调查“发现旅行”(Voyage of discovery)，秋天在学院里公开旅行收获的成果，举办学术讲座。参加他组织的“发现旅行”的学生达尔文，1859年把自己的著作《物种起源》“献给塞奇威克教授”。塞奇威克也参与创立剑桥哲学学会，经常为其会刊写稿。1832年12月17日他在特立尼铁学院举行的纪念基金

捐款者仪式上的讲话，是一次替代与会贺词的做礼拜的教义宣讲，也是后来被整理成单行本出版的《有关大学研究的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的底稿。这次演讲受到与会者的欢迎，1834年得以出版，塞奇威克对演讲稿作了补充，正式出版时的书稿篇幅是原来的两倍。出版后受到好评，1833年至1835年间四次重版。但是，倘使读了本书所收的密尔的《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就知道塞奇威克遭到密尔严厉的批评。塞奇威克的《讲义》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首先是因为他涉及的论题都是读者关心的话题——大学改革、地球起源、功利主义理论等。它也表明英国国教圣职者们对这些问题态度：在科学、哲学的各领域坚持强化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密尔在《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批判塞奇威克有关大学中历史、古典文学地位的分析和对功利主义进行否定的观点。而密尔对英国大学应该如何发展的见解，在30多年后的《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中更加成熟、周全地表达出来了。

撰写《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一文时，正值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内部各种改革呼声高涨，涉及课程内容、考试方法、授予学位资格制度等方面。塞奇威克是辉格党党员，也支持大学内部改革运动，所以写了《讲义》。因为牛津、剑桥大学与英国国教的联系依然非常强韧，密尔在《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中，虽然也提到这一点，但仅一笔带过而已[威廉·汉弥顿(Sir William Hamil-

ton)曾撰文(*Discussion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Reform*, 1852)就牛津、剑桥大学与英国国教的关系这一点提出过激烈的批评],主要矛头指向塞奇威克对功利主义批判中显现的破绽。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塞奇威克参与大学改革、课程设计的资格后,指出塞奇威克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显示其学术水平是不称职的。密尔晚年在自传中如是说:

在我第一次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稿的时候,通过选择文章的主题,又有机会将自己协调新旧“哲学激进主义”的计划付诸实践。塞奇威克教授在自然科学一个特定领域很有名,但是他不应该越界进入哲学领域,他最近发表了《论剑桥大学研究》一书。此书攻击分析心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这激发起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义愤,我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我设想,这是个机会,既能击退不公正的批评,同时又能把我对那些问题的许多看法插入到我对哈利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辩护之中去,而这些看法和我以前的同事是不同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由于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把这时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看法都说出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在他为之撰稿的《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中也根本不可能说出来。^①

^① 《我的知识之路》,郑加丽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7—238页。

1859年将《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收入《论说与论考》(*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文集时,密尔又补充说:

在《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中,自己给读者的印象似乎迷信洛克和边沁,一点也没有注意他们的缺陷,可是,假如人们读了我以后有关论述洛克、边沁的著述,想必会改变对我的这种印象。

所以,我们中国的读者今天读这篇文章时,要注意密尔不同时期思路和文字的变化。我在翻译和编辑这篇文章时考虑到这一点,把1859年这篇文章收入文集《论说与论考》时修改过的地方(1867年版本与1859年版本相同)和最初在《伦敦评论》刊出时的样式一并译出,为研究密尔学术思想演变的中国读者提供对比的便利。

另外,《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原著段落不分明。遇到不明的地方,编者根据上下文语义自行分段。再有,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对两篇文章中的一些人名、相关事宜补充了一些译注。

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 典礼上的演说

依照贵校的惯例,被诸位选为名誉校长¹的人需要在就职演说中对一个博雅教育工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首先我想说,这是个非常值得称道的惯例。就其更广大的意义上来说,教育是可谈内容最难以穷尽的话题之一。迄今为止,诸多哲人就此谈及的问题之多,也是其他问题所不及的。但是,对于以一种新的趣味直面这些问题(广义上的教育问题)的人们来说,即对于前人的观点未感到完全满意的人们来说,他们就如最初探索这个问题的人们一样,“教育”依然完全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且,尽管至今已经有很多人表述了出色的观点,但是凡是有思想的人,无论谁都会感到现在依然存在还没讨论到,或者说还没有定论的,与教育有关的大小问题。

所谓教育,必须由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的观点来考察。因为在所有具有多个方面的问题中,教育问题包含的方面是最多的。当然,教育中包含了向人格的自我完善这样一个特定目标一点一点接近的自我努力和